

清华的许多教师能够跟上世界科学前进的步伐，有的处在先进行列。

在清华园的学习仅历一年，而且是80多年前的事了，今日的记忆只是当年清华的只鳞片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清华大学，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

各类优秀人才，其规模以及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经验，都是今非昔比的。

今年我已年届百岁，在清华108周年校庆前夕，我衷心祝愿母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9年4月

我走过的人生路

○朱森林（1948—1949 社会）

我今年89岁，明年就是90岁了，到了人生的边沿上。我有幸生活到这个新时代，一个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新时代。现对我走过的革命的人生路作一些回顾，作为我对党的培养、教育和母校的感激之情的一个汇报。

清华学子，报国有门跟党走

1948年夏天，我考取北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报考外语系，入校后改读社会学系），由上海清华校友会组织，乘坐招商



朱森林学长近影

局的“执信”号轮船北上，途径辽东半岛，有人指点说，对面就是解放区。当晚，就有人跟我们接触，向我们宣传解放区的情况。那时，我年纪还小，虽也读过一些进步书籍，但认识不深，满心都是去大学求知求学的欢喜。

进入渤海湾，船颠簸得厉害，晕船的同学躺在船舱里。我不晕船，从船头到船尾来回走。我们睡在甲板上，海水经常溅湿了被子。经过一夜航程，目的地天津塘沽到了。

下船后，迎接我们的是一批清华同学，他们热情地帮我们运行李、上火车。在天津码头，我结识了化工系的陈宜焜，他负责接待帮助我。

当时的清华大学被誉为“蒋管区内小解放区”，民主气氛浓，爱国学生运动、社团活动如火如荼。到校不久，在陈宜焜介绍下，我参加了“春泥”团契。

团契最早是基督教青年相互分享和交往的一种传教形式。党借用这种形式来发展进步学生，做学生工作。团契组织的活动有学习讨论、看进步书籍、唱歌、跳集



1949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同志合影。后排右1为朱森林

体舞等。如传阅《新人生观》《方生未死之间》等书籍；讨论对人生的主张：反对怀疑派、定命派，提倡服从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的科学人生观。大家在融洽、欢乐的气氛中说家常、谈抱负。

1948年11月4日，我18岁生日的时候，团契负责人之一张一华（心理系）为首的几位契友给我写了非常感人的生日贺信。信头信尾的署名都用了化名，我叫“竹笋”，张一华叫“小兔”等。

信里讲了形势：“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在日夜流，现在要生的已经生出，要死的还未死去。”意指革命即将胜利，蒋政权将要死亡。

讲了对我的期望，“如何迎接这大时代？”“殷切地期望，从今天起你能更积极地负起你的任务，充实自己，准备作黑暗中的火把，把光明贡献人类，也希望你能夠化为泥土，让新中国的幼芽长得更茁壮。”

信中对我个人的优点和弱点进行剖析，提出了深切嘱咐：“你聪慧、热情、富有正义感，这是值得注重的地方。我们期望，不要浪掷了智慧，踏实地生活，

不放任自己。好学的精神，还必须有批判的目光去辅助。坚强的信念，必须与实际生活一致，才不致流于空泛、脆弱。”讲得多好啊！

这些话，深深地、长久地印在我心里，成为启发革命激情的一种动力。

生日过后不久，团契负责人陈宜焜、张一华发展我加入“中华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这是地下党外围青年组织中的一个，我当然高兴地加

入，并参与一些活动，如刻写蜡版，把从解放区电台收听到的消息油印传播等。

形势发展比多数人预料得要快。1948年11月上旬，辽沈战役结束，解放战争胜利推进。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是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立大学。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我们精神饱满地从清华园乘火车到前门外欢迎解放军。在锣鼓爆竹声中，我们翘首期望，望着整齐排队的解放军雄赳赳走过来，汽车和马匹拉着大炮紧跟其后，新缴获的坦克也开过来，大家欢呼雀跃，追着解放军的脚步高跳、欢歌。随后，大家又分别参加“清华迎接解放服务队”，我们被分配到城里一所中学宣讲革命形势。

解放军入城后的第二天，在北大举行了全市地下党员大会，地下党转向公开的执政党。“中华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组织关系，组织上明确可以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3月20日，我们在清华大礼堂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成为最早的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解放后的清华园呈现一片欢乐的气氛，每个人都兴致盎然地谈论着，我们胜利了，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憧憬。教务长钱伟长向全校同学作动员，学理工的留下继续深造，学文法的到社会大熔炉去，参加革命工作。

这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行胜于言，国家建设正当时，百业待兴，我们该尽绵薄之力；也有人觉得，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求真学问、学真本领，欲速则不达。

我那时年轻、冲动、富有激情，没有一些年长的学长那么纠结，觉得我们搞社会学研究的，光在书斋里面闭门造车不行，还是得走出去，加入到共产主义建设中，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我们那批学子最终出来工作的人数虽然不是太多，但也不少。

在组织的动员和安排下，同学们分批参加了北京市的工作，我分配到外三区搞民主建政工作，从工作组到成立第二街政府，又从街政府到公安局外三分局公安派出所。在我任派出所所长期间，带领辖区群众参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这是终身难忘的大事。

当时，组织上担心同学留恋学校，告诉我们说出去工作一段时间后，想回校读书的可以回去。实际上，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建设中后，绝大多数人没有回校再读（后来中央教育部有一规定：凡学习中途因革命工作需要不能返校者，都算作毕业）。

我也是如此。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清华的时间虽短，但对我的思想、行为影响非常深远。2001年清华90周年校庆之际，我写过一首《忆清华岁月》：“方生未死启蒙篇，



朱森林（左）与霍英东一起视察广州番禺南沙

人生价值作思辨。情结春泥深款款，革命征途始着鞭。”同时，写诗为母校贺：“九十载耕耘，十万学子，自强不息振中土。新世纪祈盼，一流学府，厚德载物誉全球。”

奔赴南国，多个岗位的磨炼

1952年应广州市委要求，将北京、天津支援搞“三反”“五反”工作队的一批同志留广州市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在转到广州工作前的7月，我在北京外三公安分局经办公室主任卫道崇、治安科长任均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到广州市工作，从市委组织部的干事到科长、处长，到从化县委常委、越秀区委书记（工作六年）。广州是南方大城市，解放后有很大发展，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造成很多困难。大家曾称广州有“三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是它的真实写照。

县和区的工作很实际，对人民群众的需求感触也深。计划经济下的价格管制，

□ 回忆录

违反价值规律，流通体制僵化，是造成上述状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蔬菜等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什么时候上市都有规定，完不成任务要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通心菜只有1/3能吃，“可食率”成为当时的专有名词。

我任从化县革委会副主任时，与供销社人员一起，按要求到农民手上收购家禽，每户一只，由于收购价格低，农民不愿卖，卖也是卖瘦鸡，闹得“鸡飞狗跳”，双方都不愉快。

市民买东西同样麻烦，样样要凭证，粮票、鱼票、肉票、布票……有一件事对当时刚刚到广东主政的习仲勋同志触动很大，有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他在一次会议上拿出这几张鱼票，要求大家深入解剖鱼票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这样一来，物价改革率先在广东发展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我曾和市委政策研究室一部分同志到广州芳村做过调查，认为应该给农民种植自主权，否则农民就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后来，市委决定实行“三放开”：“放开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让农民自主经营。广州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进行价格改革的城市，1978年，芳村最早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后来广州市也陆续放开农副产品价格。

价格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困难与杂音，物价上涨较大，导致市民情绪波动，反应强烈，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甚至有人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

但长痛不如短痛。不放开农副产品的

价格，不触动违反价值规律的价格体制，就无法解决商品缺乏的顽疾。因此，我们不顾“阵痛”顶住各方面压力，成功实现价格“闯关”。一段时间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农民收入增加了，市民也得到了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当时的大环境对改革开放存在争论，广东的改革开放就在这种争论中，怀着期待、探索及某种程度上的坚定先行一步。

率先向中央提出要让广东“先行一步”的就是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后，深入考察调研，倡建深圳经济特区，针对当时广东的种种弊病，提出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主要是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他可以说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启者、奠基者，带领我们越过急流险滩，“杀出一条血路”。

主政广州，接棒花城绘新图

如果将广东的改革开放比作是一场长期的接力赛，那么我就是中间接棒的。自1981年到2001年，从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到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在广东改革开放从起步到蓬勃发展至至关重要、也是最为自豪的20年，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84年，广州市计划筹办经济开发区，我主动请缨，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同志就说：“既然你想搞经济工作，那你就去筹备开发区吧！”

就这样，我带着兼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名义启动筹建工作。开发区购置的第一批资产是单价37元的10张办公桌，没有办公场地，我们只能租用东方宾馆副楼的一间会议室，结果办公桌过于简陋，宾馆门卫不让我们往里面搬。有人笑着说我是“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办广州开发区”。

那段日子确实比较艰苦，开发区的筹备和建设初期，地域偏、环境苦，政策、资金来源、人才、技术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好在广东上下对开发区工作很重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国务委员谷牧同志都先后现场考察开发区的选址、企业引进等工作，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同志专门拨款3000万元作为专款专用开发资金。这让各地开发区都很羡慕，说广东是真心支持开发区建设。

后来，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交流经验，认为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等5个城市的开发区办得很红火，有了“广大上青天”的称号。

开发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称得上广州当时飞跃发展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广州市还是下面的区县，总体来说，条件都是艰苦的、物质也是匮乏的，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除了上面给政策、给支持，我们也唯有咬紧牙关，求真务实、追求效率、开拓进取。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广州面临严重的用电紧缺问题，一个星期停电三四次是常事。市民对此很有意见，幽默的批评者说：“我们全家准备今晚去市长家里看电视，因为这里已经停电一个星期了！”火气旺的直接骂：“你这个市长怎么当的？连电也解决不了，这样当市长有什么味道？”报纸上出了讽刺漫画：打开冰箱一看，冻鸡变成了烤鸡。

当市长免不了挨骂，挨骂也有好处，它会使人清醒，当然，我希望尽量做得好些，少挨一些骂。于是，我们开始筹资自己办电，增加了已有的发电机容量，并筹建了大容量的珠江发电厂。

1980年，广州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第六，居中下水平。我从1987年下半年到1988年，提出了一个口号“超天津”，只用于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经过几年努力，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1990年广州GDP319亿元，天津GDP300亿元），首超天津，仅次于北京、上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第一。

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代表、中央候补委员。

省府运筹，改革开放新气象

1991年5月，我接替叶选平同志担任广东省省长。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我有幸陪同他老人家到珠海视察，亲耳聆听了他那闻名中外的“南方谈话”。小平同志要求广东20年要赶上亚洲“四小龙”，这是他基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立足于国际间实力的较量，面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对广东所做的政治嘱托。这是对广

□ 回忆录

东改革开放新的要求，是对广东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大好机遇。

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我们对“四小龙”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对其20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认为要20年内赶上“四小龙”，就必须在未来的20年内平均经济发展速度超过13%。当时，人们特别是港澳的一些人士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过持续20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的。我们坚信，党中央提出这个目标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符合广东实际的，广东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努力，一定能实现这个奇迹的。因而我们脚踏实地面向宏大目标，制定科学规划，分两大阶段，一步一步去实现。

要经济大发展，首先必须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大发展。而前提就是利用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我们加快利用外资发展的步伐。1991年实际利用外资25亿美元，1992年达到48亿美元，1993年增至96亿美元，从1994年开始每年都超过100亿美元。我们积极开辟海外市场，增加出



1991年7月，朱森林（中）考察大亚湾核电站

口创汇。到1994年底，广东省实现了出口总额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四分之一。我们上马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包括向香港供水的东深供水三期工程、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广深高速公路、广梅汕铁路，等等，使广东初步形成现代海陆空交通网络框架。

在兴建基础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大项目过程中，我们注意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减少对土地能源及其他资源的过度损耗，甚至尽可能对历史文物影响最小。例如飞贯珠江的虎门大桥，是我国第一座大型悬索桥，主跨度达888米，规模宏大，修建技术难度大，桥位地质和地理环境相当复杂，位于我国人民抗英斗争的古战场虎门，周围文物密布。既要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桥，又要保护好文物。我们当时秉承“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决定由本省的工程公司来设计、施工，从大桥选址、定桥型至动工兴建，组建专门的攻关小组全程跟进。特别是桥位选址上，我们组织进行了全面细致勘探，才选定对文物影响最小的现行桥位方案。

但当东锚基坑开挖全面铺开时，施工人员在威远山顶意外地发现了一条鸦片战争时期留下的古坑道。这一发现引来了争议：考古学家担心会影响虎门炮台遗址；建筑专家则认为并不影响。面对争议，我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和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同志到现场调研，并向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汇报，得知虎门大桥建设只影响炮台遗址的一些坑道，就决定继续兴建。李鹏同志要求在虎门炮台遗址旁建一个虎门炮台博物馆。建桥的同时，我们还筹措资金，投资近亿元，建成

了一个虎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全面修复的虎门炮台群、鸦片战争海战馆和鸦片战争纪念广场等。

广东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每天都有新企业挂牌成立，数量多且活跃，民间投资发达，资本做强意愿强烈。为了给企业股份制改造提供平台，打造股权交易的完整链条，帮助企业正常运转，并为创业资本创造一个完善有效的风险退出机制，鼓励创新，我们决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1991年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这对于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制度化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支持了一大批广东企业的融资，对深圳乃至整个广东早期和现在的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典礼上，我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表示了热烈的祝贺，认为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不仅标志着深圳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也为广东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93年，中央决定在全国推行分税制。分税制必须有返还基数，从哪一年开始，对于广东而言，相差达100亿元。财政部的方案是以1992年的年终数为基数，我们考虑到地方的难处，向中央提出以1993年为基数。中央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后，决定返还基数由1992年改为1993年。这样既维护了地方利益，又保证了中央实施分税制大局。后来，很多省市来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们敢于直言，向中央说明白了地方的难处。

由于坚持改革，扩大开放，1991年到1995年这5年间，成为广东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全省GDP每年递增19%。1995年，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8.5倍，翻了三番还多，为2010年赶上亚

洲“四小龙”开了个好头。人民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增长7.2%，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收入增长11.4%。当时还“消灭”了很多极为贫困的地区，全省（包括石灰岩地区）400万贫困人口，320万实现脱贫。

在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十四大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

人大五年，依法治国新探索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这过程中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急需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调整，许多新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为当时广东所特有，国家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广东人大地方立法必然要先行一步。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视察广东，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广东可以成为立法工作试验田，先行一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全速推进立法”的动员令，广东地方立法进入“快车道”。

1996年，我转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积极推进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广东。当时，省委很重视，专门做出了推进法治建设的决定。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初广东赖以发展的政策优势和地缘优势逐渐淡化，必须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使经济社会得以持续发展。广东省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行了一步，依法治省方面应该与之相适应，对此既要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又要看到它的艰巨性和渐进性，需要做长期不懈的努力。

1996年，广东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

□ 回忆录

省专利保护条例》，该《条例》被誉为“专利法规建设的里程碑”，受到《中国专利报》高度评价：“广东带了一个好头”，“解决了十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行政执法工作的一些难题”。

1997年，我们尝试让更多的学者、专家、律师、普通民众加入到立法队伍中来，于是，在常委会审议两个月前，在《南方日报》上刊出《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短短两个月时间征集到了上百条，许多建议被采纳。

1999年9月9日，广东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立法听证会，在全国开了先河。那次听证会的内容是，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从而确保该项法规能“保证大多数企业和个人的利益”。

听证会召开10天前，我们分别在《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公开举行立法听证会的消息，将听证会时间、地点、内容、报名方法、报名电话等信息予以公开。消息见报后，各界反响强烈。短短的几天里，报名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就有30人，还有30多人报名参加旁听。报名者包括律师、建筑业从业人员、专家、学者、在校大学生、外国领事馆官员等。海内外新闻界也高度关注此事，有28家新闻单位要求采访报道，包括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等，以及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澳门《澳门日报》、美国远东经济论坛等境外新闻媒体。

9月24日，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听证会上的意见，有不少被采纳。该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经由立法听证程序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广东可以说是对立法技术和立法程序进行了全新尝试，在我国立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0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是全国首部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

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承担着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的历史重任。广东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断地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敢于探索实践，充分发挥了立法试验田的作用。在我任职期间，广东不断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立法思想束缚，大力加强经济立法。有先行性、实验性内容的法规，占广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数40%以上。

2001年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来广东视察，我汇报了广东依法治省工作，受到李鹏的赞扬，李鹏对我说，“广东要在依法治省上走在全国前列”，“现在广东的经济已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法制就必须跟上来，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我把广东的法治建设写了一本书，叫《依法治省的理论和实践》。

我置身于广东工作到70岁，在2001年2月离休。

广东的伟大的建设成就是党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拼搏、砥砺奋进的结果，我只是尽了力。此稿的组成，有我原身边工作人员林晓东、江泓、黎赐锦、郑勇明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清华校友热情邀稿，我已年迈，又经中风，写得不妥之处，请原谅并予以指正。

2019年4月